

《十五年战争研究史论》读后

周启乾

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教授江口圭一先生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他继《日本帝国主义史论·满洲事变前后》(青木书店 1975 出版)和《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青木书店 1998 出版,中译本即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之后,又于 2001 年 5 月出版了第三部论文集《十五年战争研究史论》(校仓书房)。该书收入 1970 年代中叶直至 1990 年代末撰写的有关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依据史实深入探讨,俱见著者之功力。全书共分为 12 章:1. 两面的帝国主义论——以满洲事变期为中心;2. 满洲事变期研究之再探讨;3. 满洲事变与军部——关于藤村道生氏之所论;4. 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5. 陆军省的满洲事变观;6. 满洲事变时期陆军省的小册子;7. 卢沟桥事件论;8. 蒙疆政权;9. 日中战争时期海南岛的鸦片生产;10. “关特演”的正式名称;11. 十五年战争、冲绳之战、残留中国的孤儿问题——围绕教科书的审判与审定;12. 书评。书中不少章节的内容可供我们参考借鉴,值得另行详细介绍,兹不赘述。对于本书作出全面评论,亦非笔者力所能及,这里仅略抒读后感想如下。

一 学问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就日本帝国主义史进行了多方

面的研究,探讨了导致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有天皇制法西斯论和双重外交与双重帝国主义论。前者强调日本统治阶层在对外侵略问题上的根本性的一致,认为统治阶层中出现的分裂与对抗只不过是暂时的、部分的、相对的和战术上的,但对于表现为暗杀、武装暴动与政变、阴谋诡计等的激烈对抗,却缺少合乎逻辑的说明。至于后者,则重视所谓统帅权的独立和“国务”与“统帅”之间的分裂,进而主张所谓近代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与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的双重存在。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有井上晴丸和宇佐美诚次郎指出日本资本主义“侵略与从属的两面的国际地位”,一方面是以庞大的军备发挥其“远东宪兵”的作用,同时又利用列强之间的对立,不时投靠英国或美国(《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构造》,岩波书店 1951 版)。然而,井上与宇佐美的研究却未能进一步展开。

江口先生不满足于前人的论断,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两面的帝国主义论”。他着力从国际金融、对外贸易结构以及资源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脆弱性与对美英的极大依赖。井上和宇佐美把日本对美英的关系规定为“从属”(subordination),但是没有说明双方还有对立的一面,江口则指出,自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期间,双方关系虽然可以用“从属”来说明,但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则发生变化,围绕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与美英之间的关系具有依赖与对立的两面性,日本帝国主义有其作为军事大国自立(independence)的一面,但又离不开对美英的依赖(dependence),所以称它是具有“从属”与“侵略”两面性的“两面的帝国主义”。(20 页)于是,在对外路线上就反映为顺应华盛顿体制的对美英协调路线与坚持亚洲门罗主义而与美英抗战路线的对立与分裂。

与此相关联,对于天皇制立宪主义的分析同样是著者的理论

贡献。他认为,在帝国宪法规定之下的日本国家体制是天皇制立宪主义,它又具有专制主义和立宪主义这样两个侧面,前者的突出表现是具有神权的天皇处于超越一切的顶点,并亲率陆海军,还有元老、内大臣等形成的宫中集团、枢密院与贵族院等特权机关,后者则表现为天皇的大权并非没有限制,而是在议会的“协赞”和国务大臣的“辅弼”之下行使,以及以众议院为基础的政党势力。国家权力结构与政治体制中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侧面,对于内外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统帅权的独立,使政府、议会无法介入统帅,但军部对于国政、外交却拥有了强大的发言权。如果说1920年代天皇制立宪主义所具有的立宪主义的一面还发挥着作用,但进入30年代后即日趋削弱,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满洲事变即成为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压倒对美英协调路线的转折点,从而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使日本帝国主义陷于始料不及的长期消耗战中,直至其最后毁灭。(39页)通过著者的理论构建可以看出,他是在吸收与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 历史学者的史德与史识

作为一位正直的学者,江口先生早在1982年已明确指出,日本对于中国、朝鲜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与加害,正是日本近现代史上的最大问题,这段历史问题与当前乃至未来都有极深的关联,所以对它的研究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80页)他认为,日本历史学界对于日中战争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日本方面或日本国内,对于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这一战争史上第一位的问题,却不够关心,甚至连基本事实都不掌握。相反,倒是一些作家和新闻记者致力于调查日军的加害行为并作出了贡

献,例如,森村诚一揭露七三一部队,本多胜一揭露平顶山事件,泽地久枝查明此次屠杀的指挥者,等等。(83 页)江口还指出,在日本,把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普通居民被卷入战争当成悲惨的经历而大书特书,但是,在日中战争中,从始至终都把中国的非战斗人员卷入了战争,而对于这一悲惨的真实情况,即“侵略与加害的最为具体的本质的部分”,日本迄今的历史研究中又说明了多少呢!这样,“与中国民众的认识之间便产生了巨大的差距”。(83 页)

著者在指出日本学术界不足之处的同时,也身体力行,于 1981 年实地考察了平顶山,深感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未能确认和澄清之处仍多。他参观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深感学习与借鉴中国方面研究成果与史料的必要,呼吁把中国民众关于战争体验的记录保存下来,并从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紧迫的课题”。为了推动日中战争史的研究使之趋于完善,“最为必要和有效的方法,当是日中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84 页)可以说,著者尊重事实的品德与卓越见识,是其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基本保证。

三 准确看待日本民众在侵略战争中的态度和作用

在以往的日本近现代民众史研究中,常常把主要力量用于挖掘其革命的、反对现行体制权力,以及主张国际上的团结合作等等侧面,希望由此证明和表彰劳动群众先进部分的先进行动,而其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应予否定的一面却被忽略掉了。我国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也多注重于其统治阶层的决策,而忽视作为其社会基础的民众的动向。江口先生研究了民众对战争的反应和被动员到战争中的情况,指出他们在国内处于社会底层,有其受压迫的一面,但作为帝国主义统治民族的一员,又具有作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一面。他们不满于生活中的困窘与郁闷,急于改变现状,在满洲

事变之后,随即毫无掩饰地露骨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敌意、报复心与侵略的欲望,反映出了好战与排外的一面。在中国,他们更是陶醉于作为征服者的优越感之中,表现出许多“旁若无人的举止”,直至更“残忍”地对中国人民滥施了无数暴行。(93—97页)

江口还认为,民众当然并不总是侵略者和加害者,一般来说,劳动群众在反对现行制度上是最为有力的,但在某种条件下,其能量就会指向被压迫的异民族的民众,“这也是帝国主义统治民族民众的一般倾向”。(97页)不过,以往的研究常常是不愿看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在心理上感到有负于劳动群众,受到唯心的民众美化论的支配,只看到了后者被压迫的一面;第二,担心强调民众作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一面,就会与统治阶层模糊战争责任的“一亿总忏悔”的说法牵扯到一起。于是,广大民众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行为与责任,就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著者对于日本民众态度与作用的辩证分析,十分有助于认清这场侵略战争的社会基础,对于今后面向未来构筑中日之间的持久和平,也极富启发意义。

四 在艰苦条件下不懈地揭示历史的真实

包括本书著者在内的日本进步学者与有识之士,为揭露侵略战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作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著者在《山田支队与小野贤二》一文中,介绍了福岛县一个化学工厂工人小野贤二的事迹,令人感动。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虽然承认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与1937年12月14日占领幕府山炮台,并俘虏约1.5万人,但认为其中约一半的非战斗人员被“释放”,另一半人趁火灾逃跑,为了释放剩余人员而向长江岸边押送时发生“暴动”,日军不得已开枪打死约千人。然而,否定了“自卫开枪说”这一无稽

之谈的正是小野。

小野于 1988 年参加了日本民间团体组织的“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记录访华团”，并以此为契机，在 1988 至 1995 年间利用三班倒休和节假日的工余时间，投身于调查工作。他以构成当年山田支队骨干的《步兵第 65 联队战友名簿》为线索，寻找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当事人，几乎走访了名簿上所有的人或其家庭，获取证词约 200 篇、阵中日记 24 册、采访录音带 100 盘以上、录像带 10 盘。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任何日记中都没有“释放”俘虏以及俘虏“暴动”的记载，事实是山田支队于 12 月 4 日在幕府山附近俘虏 1.4 万余人，15 日又俘获数千人，根据命令于 16 日在江边枪杀 1/3，17、18 日继续枪杀，18、19 两日出动兵力处理尸体。小野的调查工作历尽艰辛，经常遭到冷遇乃至威胁辱骂，但他考虑到当年的士兵们已居高龄，如果错过时机就将造成永远的遗憾，终于战胜孤独和紧张坚持了下来，通过深入挖掘确凿的第一手资料，为彻底粉碎右翼的大屠杀否定论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小野作为一名非专业工作者作出如此贡献，受到了广泛赞誉，他的业绩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史中将“永葆光辉”。（402 页）

江口先生本人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的遭遇同样说明，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经常会受到不应有的阻挠。他在 1982 年为高中用日本史教科书撰写十五年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时，认为应该尽量具体记述战争的加害与被害情况，从而说明战争的悲惨，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为此，他在教科书中首次增写了战争末期冲绳地面作战的内容，并指出“约有冲绳县民 800 人被日军以妨碍战斗等为理由而杀害”。（345 页）然而，在审定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刁难，“显而易见是文部省顽固坚持不许写出日军杀害县民的事实”。（348 页）被删改得面目全非的第四次修改稿虽然勉强“合格”，但是，冲绳全县为此而展开了抗议文部省的审定和要求恢复

原有记述的运动,并由县议会向文部省提出意见书,终于迫其同意恢复了原有记述。这再次表现,历史事实是不容歪曲的,为之不懈奋斗的有识之士的艰苦卓绝,也将永载史册。

五 不断发现和掌握新的史料

本书著者最为重视实证研究,可以说一切分析和结论无不立足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第六章的主体部分曾于1987年发表。如所周知,所谓“陆军省小册子”,一般是指陆军省新闻班于1934年10月10日发行的《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但是,自满洲事变以后,日本陆军省调查班不定期发行了许多小册子,鼓吹事变的“正当”与“国防”的至上,展开了持久的宣传活动。据著者统计,小册子的发行数是1931年18种,1932年37种,1933年34种,1934年1—6月由军事调查部发行14种后,改由新闻班发行,当年共19种,1935年9种,1936年5种,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2种,1931—1937年发行总计达124种。著者掌握了其中的百种,并就其出版与分发的情况以及内容的变化作了仔细的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在宣传满洲事变与伪满洲国的“正当”性的同时,极力煽动对中国以及支援中国的国联、列强、苏联的敌视,进而把这一对抗与为实现亚洲门罗主义及“传播皇道”、“八一宇”的“世界历史的转变”结合了起来,在此后的侵华战争与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提出的把对外扩张正当化的论据与逻辑,在这些小册子中几乎都已经有所反映。著者虽然还有24种未曾得见,但并无碍于对其整体倾向的把握。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著者又新掌握了陆军省调查班1932年7月刊印的《国防思想普及参考资料》三种,即第二号《满蒙问题的再认识与国民的觉悟》、第三号《苏联关系事项》、第六号《列强对满洲

事变的态度》，在出版本论文集时，著者便把对上述新资料的研究作为该论文的“补论”一并发表。（173 页）该《资料》封面上均有“严格保管”字样，但其第一号究于何时刊行，又出版至第几号结束，均不详，内阁印刷局刊印的《官厅刊行图书目录》也完全没有记载。著者认为，《资料》的出笼正值满洲事变煽起的排外热、军国热稍有降温之际，其刊行目的即是为了维持与再度唤起舆论对事变的支持，与前述“小册子”相比，内容更为露骨与夸张。例如，它强调美、苏、中“三大国”对日本的“威胁”，并已显现出了次年（1933）退出国联后将要大事宣传的“一九三五、三六年危机”说以及对苏预防战争论的萌芽，另一方面，则大肆宣扬“满蒙生命线”的意义，诱使国民怀抱由此而改善生活的希望，同时鼓吹“满蒙发展”是“赋予皇国日本的使命”、“大和民族的使命”等等（190 页），都反映出了浓厚的皇道派色彩。于此也可见，正是新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使研究得以不断深入。

六 冷静对待分歧，增进相互理解

关于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日本由此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具体化，是必然的。江口先生则认为，这次事件与由于关东军参谋有计划的阴谋而引发的柳条湖事件不同，并非因事前的计划及阴谋所挑起，而是“偶发”的事件。（337 页）这在当今日本学术界已大致成为一般公认的说法。中国学者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全过程考虑，不能接受上述观点，对“偶发”说提出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事件毕竟发生在中国的北平城外，而非日本东京城外。然而，如果简单化地把日本学者的“偶发”说一律斥为出于“民族偏见”的为“侵略行为”“辩护”，（378 页）则同样有失偏颇。

我们可以看到,著者虽然认为,迄今还完全看不到是根据日中哪一方事先的阴谋策划而引起了该事件的确证(200—201页),但他明确地指出,这“并不能说是有什么不得已的、没有责任的、不是侵略的”,而“显然是日军企图挑起的”,是日军指挥官轻蔑中国、自命不凡而又浅薄的“产物”。(218页)著者详细回顾了1935年以后日本推行“分离华北工作”并不断增兵,使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过程,指出1936年6月日本修订《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就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国,1936年9月,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炮制《昭和十一年度华北占领统治计划》等,都使驻北平的中日两军处在“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之下。著者还考察了1936年9月在这种气氛中发生的丰台事件,援引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所载,牟田口联队长训示部下,为“宣扬皇军之威武”,今后中国军队如有“不法行为”,应“立即起而予以惩罚”,于是,丰台事件便成为日后卢沟桥事件的重要伏笔。(198页)

著者指出,卢沟桥事件是日中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焦点之一,但是,日本的研究却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考证成为事件发端的究竟谁开第一枪、如何看待所谓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对立上,却没人注意日军于事变时大量杀害当地居民的事实。(82页)著者根据日中双方资料确认,1937年以后,日军加紧训练,尤其是进行夜间演习,并为奇袭中国军队作了各种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要对中国军队予以一击,而日军的行动理所当然引起中国方面的警惕而加强了戒备,作好了如果受到攻击便坚决应战的准备。著者以确凿的事实批驳了右翼为日军“免罪”而鼓吹的“卢沟桥事件前日军无意与中国军队作战”,以及“事件的爆发是由于共产党的阴谋而由中国军队挑起”等谬论。(219—236页)

著者与日本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认为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究竟是谁先开第一枪,作为历史记述虽然重要,但是这并非决

定事件性质的决定性原因。(396 页)他强调,应该直率地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要敢于面对这一现实,只有查明并承认本国历史上的过错与污点,才能说是对历史的真正认识。(235 页)由此可见,著者的态度乃是十分明确的。笔者以为,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已近 30 年的今天,通过增进相互交流与了解,两国学者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中一定会进一步消除分歧,取得更多的共识。

(作者周启乾,1939 年生,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